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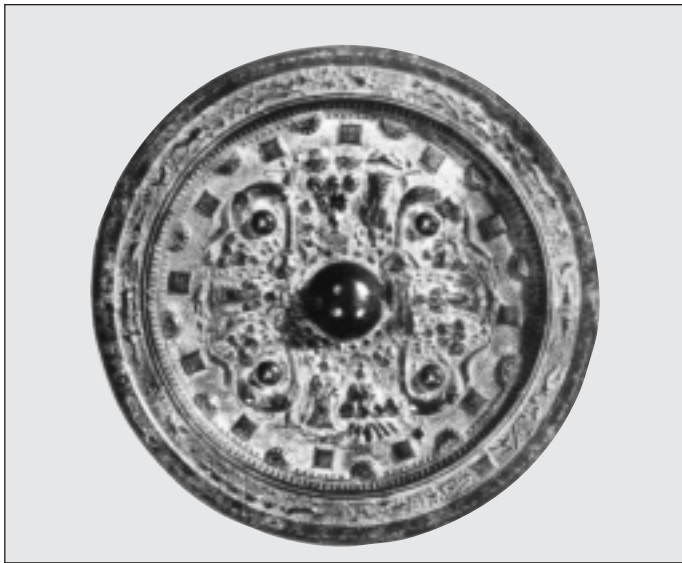
畫文帶佛獸鏡的相關問題

／熊壽昌

眾所周知，中國和日本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銅鏡，這些銅鏡的發現，對於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均有著重要的意義。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廣泛開展，銅鏡研究也向縱深進了一步，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儘管學者們付出了努力，但很多問題仍有待我們去探索和研究，本文主要探討的則是〈畫文帶佛獸鏡〉（圖一、二、三）的產地及其相關問題。

一般說來，日本出土的銅鏡上與早期佛教傳播有關的圖紋主要存在於〈佛像變鳳鏡〉、〈三角緣佛獸鏡〉和〈畫文帶佛獸鏡〉三類銅鏡上。關於〈佛像變鳳鏡〉，目前，中日雙方學者對它的認識基本一致，即認為它是中國三國時期的吳地輸入日本的，屬〈舶載鏡〉。對〈三角緣佛獸鏡〉而言，其產地仍存爭議，日

本學者樋口隆康認為它們是舶載鏡，並且認為是中國三國時期的魏鏡（註一）。中國王仲殊等學者認為它們既不是舶載鏡，也不是魏鏡，而是吳的工匠在日本所鑄（註二）。然而，對〈畫文帶佛獸鏡〉而言，兩位學者的觀點卻趨於一致，認為它們也是由中國輸入日本（註三），儘管如此，卻不見其進行深入的論證。對於兩位學者的觀點，筆者不敢苟同，因為畫文帶佛獸鏡與三角緣佛獸鏡一樣，它的圖紋涉及到「佛教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早期佛教造像的東漸」等日本佛教史上的諸多問題，所以，對該類銅鏡的產地問題，不得不作進一步的探討。



圖一 1.長野縣飯田市上川路御猿堂古墳出土畫文帶佛獸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開善寺藏）



圖一 2.原大阪府河内金剛輪寺舊藏，現藏于京都國立博物館畫文帶佛獸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

一、畫文帶佛獸鏡的類型與特點

日本出土的銅鏡無論是數量還是類別都很豐富，如蟠龍鏡、神獸鏡、畫像鏡、夔鳳鏡、獸首鏡……等，其中，帶有佛像（佛飾）的鏡子僅見於佛像夔鳳鏡、三角緣佛獸鏡和畫文帶佛獸鏡三類，而畫文帶佛獸鏡見於著錄的則有七例，其中，六枚在日本，一枚在德國。茲分述於下。

第一類，共一枚：

- 一、長野縣飯田市上川路御猿堂古墳出土，開善寺藏，直徑二三·七公分。
- 二、原大阪府河內金剛輪寺舊藏，現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與上述開善寺藏鏡為「同模鏡」，直徑二四·八公分。

第二類，共三枚：

- 一、岡山縣倉敷市日煙赤井王墓山古墳出土，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直徑二一·一公分。
- 二、千葉縣木更津市祇園沖鶴卷古墳出土，五島美術館藏，該鏡係以此類鏡為母模的翻鑄鏡，直徑二一·八公分。
- 三、名古屋出土鏡，尺寸不詳。

第三類，共一枚：

- 一、千葉縣木更津市祇園沖大塚山古墳出土，宮內廳藏，直徑三〇·六公分。
- 二、藏於柏林風俗博物館，與宮內廳藏鏡相似。

通過圖版可知，這種畫文帶佛獸鏡第一類鏡的主要特徵是鈕呈半球狀，外區依次為一周

由奇禽異獸組成的畫文帶、弦紋、輻線紋及半圓方枚帶。內區主紋以四個環狀乳為界分成四個區，每一區都為一組佛像。四組佛像均頭朝鏡鈕，配置在有蟠龍紋的四乳之間。其中佛像搭配多為兩兩相對的兩尊像和三尊像。凡是兩尊像的，為坐像和立像的搭配，主尊坐像上有蓮花紋的圓光背，坐在蓮座或兩個獅子頭上，右手貼近胸前作施無畏印，左手下垂，頭上全為雙碼髻。脇像為立像，立像都無光背，但頭上有肉髻，左手拿蓮枝，天衣掛在前腕下垂於兩側。凡是三尊像的，圖紋組成則是立像為主像，脇像為坐像，中央的一尊立像有圓光背，頭上有雙髻，天衣下垂於兩側。兩邊的脇像為正坐，坐於蓮花或獅座上。他們的紋樣雖繁縟，但刻畫得很清楚（圖一1、2）。

第二類鏡子的佛像配置同第一類大體相似，只是對稱的兩組三尊像中，有一組的右脇像為半跏思惟像，蓮座不很明顯（圖二1、2）。

上述兩類銅鏡紋飾清晰，鑄製精良，直徑處於二一公分至二四公分之間。

第三類鏡子為翻鑄的畫文帶佛獸鏡，紋飾與上述第一類相同，是以第一類為母模的翻鑄鏡，因鑄製粗糙，故被日本學者歸於「踏返鏡」中，不同之處是，該類鏡是在第一類鏡的基礎上，外面又加了一周寬素帶，因此，直徑超過第一類鏡，達三十公分以上（圖三）。

三類銅鏡中，銘文清晰者有（吾作明



圖二 1. 岡山縣倉敷市日烟赤井王墓山古墳出土土畫文帶佛獸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二 2. 千葉縣木更津市冲鶴卷古墳出土土畫文帶佛獸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五島美術館藏）



圖三 千葉縣木更津市祇園沖大塚山出土翻製畫文帶佛獸鏡（宮內廳藏）

竟〉、〈幽凍三商〉之類。它們除了引入佛像代替神仙像外，半圓方枚、乳丁、銘文形式及整體風格與中國三國時期東吳地區鑄造的神獸鏡十分相似，如果不仔細辨認，則很容易將兩者混淆，這一點必須引起我們的注意。

二、中國的畫文帶神獸鏡不等於日本的畫文帶佛獸鏡

雖然畫文佛獸鏡與畫文帶神獸鏡及其它鏡類在日本出於同一時期的古墳中，但它們的分佈地域、存在數量、圖紋內容都存在明顯差異，第一，畫文帶佛獸鏡見於日本舊藏或出自古墳中，數量少；第二，畫文帶佛獸鏡圖紋主要由佛像組成，不見任何神像，甚至「半神半佛」的圖像也不會看到，可稱其為「有佛無神」；畫文帶神獸鏡主題紋飾則由「東王公」、「西王母」等諸神仙像組成，各種神仙穿著的衣裙上常有上飄的「帶飾」，頭上往往戴著冠或用釵簪插著髮髻，其圖紋可稱為「有神無佛」。儘管在有些銅鏡上存在「佛穿神衣」的情況，但這也只是早期佛教造像流傳中的一個特徵，佛還是佛，神還是神，這兩者是從未混淆過的。

雖然畫文帶神獸鏡一般形體不大，但它在日本的出土量卻是很大的，有的甚至與中國的出土鏡圖紋十分相似。據王仲殊先生在其〈論日本出土的吳鏡〉一文中講，日本京都府相樂郡山城町椿井大塚山古墳出土、藏於京都大學



圖四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103號”畫文帶神獸鏡及其局部神像放大（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館藏）

文學部的對置式畫文帶神獸鏡與中國湖北鄂城銅鐵廠出土、藏於湖北省博物館的同類鏡酷似，它們都是「九子作鏡」。大阪府和泉市上代町黃金塚出土，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畫文帶神獸鏡與中國湖北鄂城西山鐵礦出土，藏於鄂州市博物館的同類鏡相似；其環狀乳、半圓方枚帶及「吾作明鏡，幽凍三商，周刻無亟……白牙……吉師命長」等銘文套路如出一轍。

在中國，畫文帶神獸鏡的發現就更多了，它們在浙江、江蘇和湖北等省份都有出土，我們不妨參見《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中「一〇三」號鏡。該鏡出土於湖北省鄂州市鄂鋼基建工地，直徑一八公分，緣部飾一周連續的流雲紋，外區分別由畫文帶、鋸齒紋帶和半圓方枚帶組成，每方枚上一字：「天下作鏡明而清，服者宜先皇。」內區主題紋飾中，神像共四組，其中的兩組為鈕兩邊對稱的東王公、西王母及其相伴的天祿或辟邪，兩位神仙的頭上分別戴冠插簪。剩下的兩組，其一為兩位並肩盤腿而坐的神人，肩部兩邊亦有上飄的「帶飾」。其二為一主一侍，主神頭戴三山冠，盤腿正坐，侍神側身跏坐，右手持一拂子（圖四）。這種圖紋搭配方式即構成畫文帶神獸鏡的主要特徵，即使在日本出土的此類鏡也不例外。然而，它們的圖紋構成與前文所述的那七枚畫文帶佛獸鏡有著根本的區別。在昔日的東吳地區，佛教曾一度興旺，特別是東吳首都武昌，是東吳地區最早接受佛教的地區，當時的工匠，不僅將佛像用於銅鏡的裝飾，而且還大



圖五 1. 湖北省鄂州市吳墓出土釉陶佛像（鄂州市博物館藏）

量地用在三國時期的陶瓷器上，我們從這些佛像形態上不難發現，那多重的「U」形紋皺褶、佛頭上的肉髻等與畫文帶佛獸鏡上的那些佛像形態何等相似（圖五1、2），這種佛像與神仙像的區別也是很容易判斷的。

一般來說，神獸鏡的形體較大者十分罕見，《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收錄各種神獸鏡四十八枚，直徑在十五公分至十八公分間的僅有三枚，占百分之七，多數直徑在八公分至十五公分之間；孔祥星著《中國銅鏡圖典》收錄了上海博物館的一枚「中平四年環狀乳神人禽獸鏡」，可謂是較大者，直徑也不過一九·二



圖五 2. 青瓷奩上的佛像裝飾（上海博物館藏）

公分，所以，形體較小是神獸鏡的普遍現象。儘管形體的大小不能用來區分銅鏡的類別，但形體的大小與形制是緊密相聯的，因而，這種懸殊的尺寸在考察銅鏡的類別和異同時，自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通過對畫文帶佛獸鏡與畫文帶神獸鏡的對比分析，我們認為，畫文帶佛獸鏡儘管數量少（僅見七枚），但也不應將其歸入畫文帶神獸鏡一類之中，兩者無論是從圖紋所反映的實質內容還是從造型上看，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如果將這兩種鏡子擺放在一起，相信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學者都不會將它們劃等號的，所以，它們應分屬於不同的鏡類。

三、中國無畫文帶佛獸鏡出土

說到這裡，有必要提及一下那枚被一些學者多次提到的湖北省鄂城寒溪公路出土的所謂「畫文帶佛獸鏡」（以下簡稱「寒」鏡），其圖紋內容最初是由王仲殊先生在〈關於日本的三角緣佛獸鏡〉（以下簡稱〈關〉文）中確認的。〈關〉文對佛獸鏡的論述，給我們以極大的啟示，這裡姑且不論，我們僅對其中所指的「寒」鏡為「畫文帶佛獸鏡」提出一點不同的看法。

關於這枚銅鏡的特徵，我們先依〈關〉文



圖六 1. 〈關〉文及《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上的畫文帶神獸鏡，神像很像佛像。



圖六 2. 變更光線角度後所拍的「寒」鏡

所述。該鏡直徑一五公分，平緣，緣部飾連續的流雲紋。外區主要是一周由許多奇禽異獸組成的畫文帶。內區的主紋由四組神像和四個獸形交互地配置而構成。四組神像之中，有兩組各為一像，分別為東王父或西王母。另兩組各為二像，其一組為兩個侍神，而另一組則為二尊「佛像」。由於「佛像」的存在，此鏡可稱「畫文帶佛獸鏡」。這枚「畫文帶佛獸鏡」上的二尊「佛像」，一為坐像，一為立像。坐像結跏趺坐，兩手姿式不明，頭部「可能有項光」，只是因鏡面銹蝕，「項光」已模糊不清而已。最明確的是，這尊「佛像」係坐在「蓮



圖七 1.湖北省鄂州市鄂鋼五里墩出土佛像變鳳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圖七 2.湖北省鄂州市出土佛像變鳳鏡及其佛像局部放大（鄂州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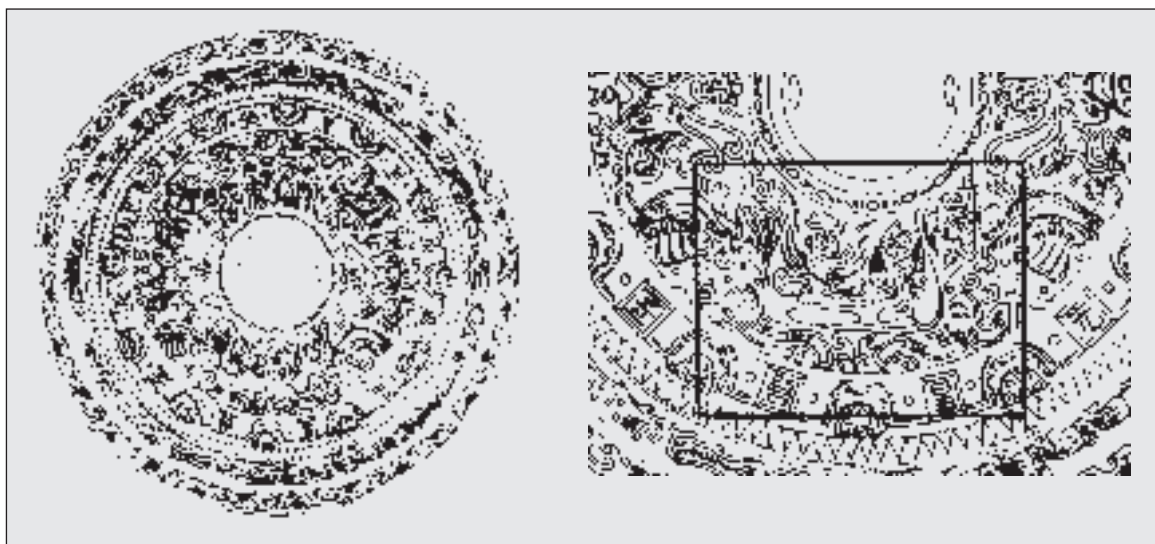
座」上，「仰蓮」的「蓮瓣」十分清楚，足證其為「佛像」無疑。立像的細部形態雖不甚清晰，但它無疑是坐像旁邊的夾侍（見〈關〉文所附圖版，另見本文圖六1、2）。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這最後兩組的一主一侍到底是神像還是佛像。從〈關〉文所附圖版來看，由於銅鏡銹蝕，後兩組的四個「人物」面部、手式、衣著及其它裝飾很難辨認，那一主一侍更是如此。說他們是「佛像」畢竟證據不足，因為，神人中夾有佛像是不是容易辨認的，神像、佛像和一般的人像，如果不看裝飾特徵，僅在面目上根本無法區別。但是，佛像夔鳳鏡則不同，它上面的佛像是較容易辨認的，其圖紋風格為平雕式的，如同民間的剪紙圖案平貼在鏡背上一樣。佛像有獨立地表現於對稱的四蒂之內的（如全跏趺坐或半跏趺坐像脇侍像、供養人像）；有僅選其頭部及項光置於鏡緣部連弧內的簡化像；有邊緣花紋內夾著飛天菩薩像的等等（註四），無論如何，他們頭部的肉髻、背上的圓光，底下的蓮座是非常明顯的（圖七1、2）。而「寒」鏡則不然，從〈關〉文所附圖版上看（雖為同一枚鏡子，但本文所附圖版與〈關〉文所附圖版效果是有區別的），「寒」鏡的紋飾大部分能夠辨認，但關鍵的細部，即那一主一侍卻模糊不清，而那一尊坐像，其「蓮座」幾乎讓人不容質疑，好像「佛」就坐在「仰蓮」之上，加上誰也說不清的手式，結果使人難免認為這一組「人物」就是一組「佛像」。

前面，我們曾拿「一〇三」號鏡做比較，其實，「寒」鏡的圖紋與「一〇三」號鏡又何曾不是大同小異？除了東王公、西王母這兩組神像相同外，剩下的兩組中，有一組就與「寒」鏡中所謂的「佛像」相似，該像仍為一坐一立，坐者頭戴三山冠，肩部仍有上飄的帶飾，坐法亦為盤腿，手式仍不清，旁邊同樣也有一位侍者，只不過這位侍者是在坐像的左邊而已（並非無右邊，可參見《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封面彩版及「九六」號鏡；圖八）。這尊像雖



圖八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96號”畫文帶神獸鏡（鄂州市博物館藏）



圖九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之“103號”“畫文帶神獸鏡線描圖



圖一〇 鄂州寒溪公路出土畫文帶神獸鏡拍攝方法不同的對比（左圖為《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書中圖，右圖為作者自己親手所拍攝，實為神像）

然也有點類似佛像的「結跏趺坐」，但單憑這種坐式是不能說明問題的，因佛像與神像都有這樣的盤腿坐式，再說，這種像的頭或肩部均無佛像特有的肉髻和項光（在佛像夔鳳鏡上，佛之肉髻和項光不僅清楚，而且銅鏡的設計者往往將其作為佛像的主要特徵加以誇張、放大，重點給以表現），他們也不是坐在蓮臺上，肩部上飄的「帶飾」實為神仙的「羽衣」（亦或羽翼），旁邊的侍像不僅沒有佛像的任何特徵，相反，手中還拿著神像手中常拿的拂塵（參見《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一〇三」號鏡線描圖，其拂塵描繪非常清晰；圖九）。顯然，他們不是一組佛像，仍應是神像。神像有神像的特徵，佛像有佛像的特徵，如果說「寒」鏡是「畫文帶佛獸鏡」的話，那麼，這若干枚與「寒」鏡類似的鏡子不都可稱為畫文帶佛獸鏡了麼？顯然，這是說不通的。

爲了進一步證實「寒」鏡上的這組人物爲神像，我們特地進行了局部放大拍攝，以展示這組「佛像」的真面目。之所以「寒」鏡出現「仰蓮」，是因爲〈關〉文所附的圖版及其局部放大的「佛像」都來自同一張照片，即都採自《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上的這枚剛好帶「仰蓮」的圖版，並非是〈關〉文的作者親自拍攝所得。事實上，這三瓣「仰蓮」的出現，只是當初拍攝照片時，因拍攝角度的原因，正好使其形成了「仰蓮」，如果改變拍攝方位或改變光線照射的角度（哪怕是換一位拍攝者），那麼，「仰蓮」便真相大白，原來這是神像腿部衣物的皺褶（圖一〇）！這樣，「寒」鏡所謂

「畫文帶佛獸鏡」的面目便一目了然了，它仍然是神獸鏡！我們認爲，畫文帶佛獸鏡同三角緣佛獸鏡一樣，也應有其特定的內涵，退一步講，即使神獸鏡上出現佛像，那也不能稱其爲佛獸鏡，因爲占主導地位的仍是「神」而不是「佛」。

四、從三角緣佛（神）獸鏡看畫文帶佛獸鏡的產地

說到平緣的畫文帶佛獸鏡，不能不涉及到三角緣佛（神）獸鏡，因爲「佛像」這一特定因素而將兩者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從日本發現的三角緣神獸鏡與三角緣佛獸鏡的情況看，三角緣類鏡中大量的神獸鏡，佛獸鏡所占比例較小，因兩者紋飾配置、藝術風格和尺寸大小都很相似，所以，有些學者將其歸於同一類型。而平緣的畫文帶佛獸鏡則不然，前面，既然我們已將其從畫文帶神獸鏡中區別開來，因它應是自成一體的鏡類。三角緣佛獸鏡與畫文帶佛獸鏡在中國從未發現，這是很清楚的事實，但爲何一些學者仍將其歸入「舶載鏡」中呢？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有兩點：第一，中國湖北省鄂城寒溪公路出土了唯一的這一枚被〈關〉文稱爲「畫文帶佛獸鏡」的銅鏡，所以，一些學者便認爲日本的畫文帶佛獸鏡來自中國的三國時期；第二，與三角緣佛獸鏡一樣，畫文帶佛獸鏡亦有精良與粗糙之分，通常很多日本學者認爲精良者產自中國，粗糙者爲當時的倭人仿製或翻鑄，且有的三角

緣類鏡上鑄有三國魏的年號，故精良的畫文帶佛獸鏡也被認為來自中國。既然，對於第一個原因，我們前文已進行了「寒」鏡不是畫文帶佛獸鏡的論述，所以，將日本的畫文帶佛獸鏡與中國的這枚「寒」鏡相提並論是不妥的。至於第二個原因，其實，無論是銅鏡的精良還是粗糙，都不能作為「舶載說」或「倭人仿製說」的證據，因為我們知道，無論三角緣佛獸鏡還是畫文帶佛獸鏡它們既鑄製精良又形體上很接近（直徑都在二〇公分以上），這與同時期產自中國的銅鏡在形體上是存在著很大差別的。

雖然日本三種類型的畫文帶佛獸鏡在圖紋配置方面略有差別，但佛像的形象卻一致，即都以「褒衣博帶」式的形象出現的。這種衣著形式是吳地士大夫裝束與印度佛像裝束相混合的產物，衣著上的多重「U」形紋飾是其主要特徵。對於這些銅鏡的形成時代問題，學者們的看法也是有差異的，有的學者認為是在吳末西晉（註五），有的學者認為是五世紀（註六）。如果依「吳末西晉」的觀點，那麼，三角緣佛獸鏡與畫文帶佛獸鏡必然產自吳地，然而，遺憾的是，它們至今尚未發現一例，相反，卻在遙遠的異國發現，所以，我們不得不這樣認為：此時的吳地尚未鑄出佛獸鏡。

前面我們說過，三角緣佛獸鏡、畫文帶佛獸鏡和畫文帶神獸鏡的外表鑄製質量與日本的若干仿製鏡形成明顯差異，因而，歷史上將這三者區分得不是很清楚，以為凡是精良者皆為中國輸入，而不問其圖紋實質，隨著研究的深

入，三者之間的差別漸被學者們揭示出來，一些學者認為其中的三角緣佛獸鏡（包括神獸鏡）係在日本鑄製（註七）。而今天，我們認為畫文帶佛獸鏡也該是從三者之中區別開來的時候了。

泛泛地說，日本的古鏡從中國輸入，這也許是對的，但就某一類銅鏡來講就未必如此。譬如，依一部分學者平緣的畫文帶佛獸鏡和畫文帶神獸鏡為中國輸入日本的觀點，那麼，同樣是質量上乘的三角緣佛獸鏡也應為中國輸入；從另一角度講，鑄製精良的三角緣佛獸鏡為吳的工匠在日本所作，那麼，同樣精良的畫文帶佛獸鏡和眾多的畫文帶神獸鏡難道就不能由東渡的吳匠所為？總之，站在哪個角度都是目前學者們所解釋不通的，所以，上述三類銅鏡在論述其來源時不能混為一談。

其實，解釋只有一種，我們認為，目前中國還未發現日本的這種畫文帶佛獸鏡，從出土吳鏡較多的省份的考古發掘報告中找不到該鏡的踪影，近年出版的若干佛像著錄中也看不到這類銅鏡。至於被一些著錄稱為「佛獸鏡」的鏡子，要麼是佛像夔鳳鏡，要麼就是帶有佛飾的神獸鏡，它們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畫文帶佛獸鏡。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正因當時佛教剛剛傳入吳地，其地位尚不及神仙道教，所以，在較為嚴肅正統的神獸鏡上很難有佛像的席位，再說，每一時期流行的銅鏡圖紋種類和社會意識形態在銅鏡上的反映也是不相同的，不可能什麼鏡上都安排佛像。只是到吳

後期及西晉，佛像作為裝飾物在其它生活用品上的應用已很普遍的情況下才逐漸應用於銅鏡，然而，此時神獸鏡的製作已經是日趨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夔鳳鏡，這樣，佛像便很自然地裝飾在這種時興的夔鳳鏡上，而神獸鏡上飾以佛教內容則少之又少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帶有佛像裝飾的銅鏡，它們出現的時間似要晚於無佛飾的銅鏡，這對於日本出土的畫文帶神獸鏡與畫文帶佛獸鏡來講也大抵如此。

〈關〉文已全面論述了三角緣類銅鏡為東渡日本的吳匠所為，我們認為，〈關〉文中所列的若干論據，如鏡子尺寸大小、中國未見同類鏡出土、主題紋飾的特徵等等，同樣可作為畫文帶佛獸鏡為東渡吳匠所鑄的依據，既然三角緣類銅鏡產自日本，為何畫文帶佛獸鏡就不能產自日本？如果有的學者硬要認為日本出土或舊藏的畫文帶佛獸鏡是中國輸入的話，那麼，這幾枚銅鏡就該真的如有的學者認為的那樣，是中國三國時期的魏王為輸入日本而專門設計製作的「特鑄鏡」（註八），然而，為一位稱臣的小國君王特地製作這種獨具特色的且數量不多的佛像鏡，不是有些小題大做或者說有失魏王的尊嚴嗎？我們說，真正的「舶載鏡」不是沒有，只不過是那種形體較小的神獸鏡、佛像夔鳳鏡及其它鏡類罷了，這的確是事實，因為中國湖北省鄂州市出土的若干神獸鏡中就可找到與日本的神獸鏡為「同模」的例證（註九）。

五、畫文帶佛獸鏡為吳的工匠在日本所產

三國六朝時期是佛教在吳地紮根、發展的重要時期，作為孫吳早期都城的武昌（即今鄂州），既是當時全國的鑄鏡中心之一，也是較早接觸佛教的地區，作為生活用品的銅鏡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佛教的印記。吳的工匠到日本後，不僅帶去了銅鏡，更重要的是帶去了鑄製銅鏡的技術。工匠們先鑄出的是部分熟悉的鏡類如神獸鏡等等，至三世紀末四世紀初，佛像及佛像夔鳳鏡傳入日本後，工匠們便又從神獸鏡和畫像鏡中受到啟發，製造出形體更大的銅鏡——三角緣佛（神）獸鏡，所以，鏡中便有神佛相混的現象。完整的佛像組合（如一主二侍）在日本流傳開來後，工匠們對佛像有了一定的認識，便在已習慣於製作大型鏡的基礎上，參照中國吳地所產神獸鏡的圖紋配置形式，又鑄製出了畫文帶佛獸鏡，而此時反映在銅鏡上則是較為明確、較為獨立的佛像了，當然也就不存在早些時候的那種佛與神相混淆的情況。很顯然，這種銅鏡頗受當時的倭人喜歡，它們同三角緣類鏡一樣，一部分也被倭人作為母模再行翻鑄，有的還別出新裁地加上了一周寬邊緣，其結果質量自然也就低劣了。所以，從這種發展過程看，日本龍谷大學的學者們將這種銅鏡的時代定在五世紀，看來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此一來，帶佛飾圖案的銅鏡在日本鑄行的情況又明朗了許多，它們的發展趨勢大抵如下所示：



圖一一 八乳八佛鏡



圖一二 畫紋帶神獸鏡

銅鏡流傳日本	佛像流傳	時期
神獸鏡（舶載） 畫像鏡（舶載） 其他鏡類（舶載）	佛像初傳吳地	三世紀前期
三角緣佛（神）獸鏡（日製） 畫文帶神獸鏡（舶載） 佛像夔鳳鏡（舶載）	吳地造像興盛佛像初傳日本	三世紀後期至四世紀前期
畫文帶佛獸鏡（日製）	日本佛像興盛	四世紀後期至五世紀以後

至於在中國，吳晉的工匠們也在銅鏡上注入了佛像，但將佛像安排在神獸鏡上已是罕見的事情，而安排在吳晉時期新興的另一種鏡類——夔鳳鏡上，則成為「佛像夔鳳鏡」，這種鏡子便自然成為中國出土佛像鏡中的代表。不妨這樣認為，佛像的流傳，在中國的吳鏡中、在神獸鏡最興盛的時候卻錯過了加在神獸鏡上的最佳時機，未能在神獸鏡上鑄出成熟（如一主二侍、衣物手式明確）的佛像來。當然，這不僅是佛教的傳播、佛像的流傳在中國的一個缺憾，也是中國銅鏡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缺憾。

補記：本文寫成後不久，又發現兩枚「佛飾鏡」，分別為「八乳八佛鏡」和「畫紋帶神獸鏡」（圖一一、一二）。前者為八乳間以八佛環列於鈕外，佛像造型一致，均為跏趺坐式，手結祥定印，頭頂有肉髻，背有項光，直徑一〇公分；後者亦為環列式布局，四組獸間四組人物，人物中三組為神像，一組為佛像，跏趺坐式，手結祥定印，背有項光，直徑一三·五公分，除了這一尊佛像外，其餘的神獸造型與布局同普通神獸鏡一樣。這兩枚佛飾鏡的發現再次證明，三國六朝時期的佛飾鏡鏡體大都形體較小，鏡中的佛像形象不甚明了，與畫紋帶佛獸鏡之佛的形象相去甚遠，它們仍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畫紋帶佛獸鏡」。

（本文寫作中，日本粟田美術館熊沢正幸先生、早稻田大學吉村憐先生、北京大學高級進修生菊地雅彥先生提供了重要資料；中國歷史博物館孔祥星先生、中國科學院何堂坤先生

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一併致謝！）

註釋：

- 一、樋口隆康：《古鏡》，一九七九年（日）新潮社：「舶載說」又見於樋口氏《三角緣神獸鏡綜鑑》，一九九二年十月新潮社出版。
- 二、王仲殊：《關於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的問題》，《考古》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東渡說」又見於王氏《三角緣神獸鏡》（日）學生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版及《論日本「仿製三角緣神獸鏡」的性質及其與所謂「舶載三角緣神獸鏡」的關係》，《考古》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等著作、論文中。
- 三、王仲殊：《關於日本的三角緣佛獸鏡》，《考古》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 四、五、王仲殊：《論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七期。
- 六、南京博物館、南京藝術學院、北京大學、（日）龍谷大學：《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版。
- 七、轉引自王仲殊《論日本「仿製三角緣神獸鏡」的性質及其與所謂「舶載三角緣神獸鏡」的關係》一文中的注釋二十一。日本學者森浩一在講談社一九九九年八月三日號《二十世紀的發現·發掘物語》中撰文說：「至今還有人主張三角緣神獸鏡全部為中國製作，這是研究史上的污點」。
- 八、日本學者觀點見森浩一：《シロポジウム古墳時代考古學》（一九七〇年）；中國學者觀點見阮榮春：《早期佛教造像的南傳系統》，《東南文化》一九九〇年第三期。
- 九、王仲殊：《論日本出土的吳鏡》，《考古》一九八九年第二期。